

改革·反改革

康有為與袁世凱

(三)

●孔祥吉

革新派威脅守舊派

百日維新後期，以光緒為首的新黨，同以慈禧為代表的守舊勢力的衝突愈來愈尖銳，而這一局面的出現，主要是由於自戊戌七月以後，光緒看到康有為的一系列奏摺和進呈的新書後，深受感動，於是對守舊派大發雷霆，「非復曩時之迂回矣」。

光緒帝七月十九日（九月四日）將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即行革職」後，又因樞臣耄老不能輔佐新政，而光緒又無權更換軍機大臣，於是乃選用新進小臣以輔變法。

「以楊銳、劉光第為陳寶箴所保以譚嗣同為徐致靖所保，以林旭為康有為弟子，故信之。令入軍機，參預新政。」軍機四章京的任命，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維新派在樞機重地的勢力。繼此之後，光緒帝又根據維新派的建議，於七月二十六日（九月十一日）下令要召見袁世凱，這就使得袁世凱有機會瞭解維新派圖謀推翻慈禧的秘密計劃。二十九日（九月十四日）光緒又赴頤和園請開

懋勤殿，引進維新派人士與東西洋政治家討論政治。

光緒帝和維新派的這一系列舉動，都使守舊勢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威脅，達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局勢逼迫他們不得不做出抉擇，要麼眼看大權旁落，要麼動員一切力量反擊，於是防變轉為進攻。

光緒密詔激起反抗

以慈禧、榮祿為首的後黨正代表了這種落後腐朽的力量，他們不會甘心情願地放棄手中的權力，於是，以維護祖宗之法為「前提」，得出了將光緒帝趕下台的「最極端的結論」。

守舊派的這一企圖是蓄謀已久的，但是直到七月底才逐漸表面化。光緒於七月三十日（九月十五日）賜楊銳的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並要維新志士們「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

光緒帝的這一密詔實際上是危險的信號

，但由於楊銳震恐，不知所為計，直到八月初三日（九月十八日）始由林旭傳到康有為手中。

康有為與其他維新派人士跪誦痛哭，心急如焚，並急忙籌劃對策。

康有為當時除了在軍事上依賴袁世凱的軍隊制服舊黨外，還提出了所謂「合邦」的建議。聯結與國，甚至實行「合邦」，這是康有為在匆忙逃離京師之前，提出的一項重要建設，其目的是企圖藉助外國的力量，來解救維新派所面臨的災難。他在《自編年譜》中寫道：

「是日（八月初三日）晝卻客，及夜，楊漪川、宋芝棟、李孟符、王小航來慰。楊言：京師市人皆紛紛傳八月京師有大變，米麵皆騰貴，並董軍紛紛自北門入，居民震恐，乃有紛紛遷避者。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艦在大沽，將與俄戰。吾未與諸公談密詔事，而以李提摩太交來『瓜分圖』令諸公多覓人上摺。」

康有為此處提到的李孟符，名岳瑞，陝

西咸陽人，光緒癸未進士，時以工部員外郎充總理衙門章京。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冬季，在維新派影響下，曾與宋伯魯、閻迺竹等創立關西學會，並曾幫助推銷《時務報》。七月初五日（八月二十一日）光緒帝賞賜康有爲「銀二千兩以爲編書津貼之費」，即由李岳瑞轉交的。在八月初氣氛已極端緊張的情況下，李氏仍與楊深秀、宋伯魯一道來慰問康有爲，足可見其與維新派關係密切。李岳瑞所云英人兵艦在大沽游弋，無疑是從總理衙門打探來的動向。據清宮電報檔記載，八月初三日（九月十九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在打給清廷的電報中稱：

「初二日戌亥，接聶提督電稱：昨下午六點鐘，由營口來兵輪七艘，三只泊金山嘴，四只泊秦皇島。風聞係英國兵艦，何以突來，若此之多等語。復於亥刻，又接該提督來電稱：查沽子藥庫在塘沽南，現外國兵輪已泊塘沽口內……各等情。除電飭羅鎮，不動聲色，暗爲防探，並一面派委黃道建密赴塘沽查探，特先電聞。」

榮祿在同日另一則電報中則云：「查係英艇，復問事由，直謂俄國意甚不善，英艇特派來此，保護中國云云。」

同一天，清廷還收到依克唐阿的電報稱：

「昨金州副都統壽長電稱：日內傳聞英、日、俄在海參崴開仗，旅大兩口俄人頗形慌亂。昨派人密往大連灣探試，頃又據回報

，果見俄國鐵甲船一只，受炮彈甚重，開仗之說，衆口紛紜。」

李岳瑞告訴康有爲「英人有七艦在大沽，將與俄戰」的動向，顯然與上述電報內容有關。可見，李氏初三日（九月十八日）晚間訪問康有爲，很可能是向康有爲通報消息而來的。這種動蕩不安的國際局勢正好爲康有爲提出合邦說提供了機會。

康有爲的幼稚想法

八月初五日（九月二十日），根據康有爲的授意，楊深秀遞上《時局艱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摺》，正式提出了「合邦」建議。

楊氏奏摺稱：

「竊近來時事孔棘，勁敵環伺，臣嘗慮皇上變法自強之計，雖如救火追亡，猶恐緩不逮事，而士大夫守舊夢夢者，尚疑爲故甚其辭，以聳聽聞。前者敵人顯繪瓜分之圖，明倡破竹之說……而此輩反詆謂康有爲所偽造，竟似臣等甘徇友黨，共蔽聖聰者。今不幸而此變萌芽果現，謂之何哉？臣聞德法諸國皆言中華守舊者阻力過大，積成痼疾，……只宜武斷從事，謀定而發，即爲所欲爲耳。……俄則分我燕、晉、秦、隴，法則分我閩、廣、滇、黔，德則分我山東、河南。英人雖本無此志，亦不得不藉手於吳、越、荆、益，以求抵制。各國重復繪圖，明畫分界，兼聞英艦七艘已至大沽……其餘諸國亦轉瞬即來耳。」

不難看出，康有爲和維新派所說的瓜分破竹的「萌芽果現」，指的正是李岳瑞所帶來的英國兵艦七艘出現於大沽的消息。這在當時並不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而康有爲卻以此爲契機，提出了要求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善，誠天下蒼生之福矣」。

然而，究竟怎樣固結英、美、日三國，如何施行合邦的計劃，楊深秀並沒有將話說盡。而在御史宋伯魯於八月初六日（九月二十一日）遞上的奏摺中則有詳細的闡明。宋氏謂：

「昨聞英國兵艦七艘已駛入大沽口，聲稱俄人將大舉南下，特來保護中國。又聞俄君在其彼得羅堡邀集德法英各國，議分中國，繪圖騰報……耽耽環視，且夕宰割，是昔僅有其言者，今將見諸事實，危急存亡，變在頃刻，若不急籌善法，一旦分裂，悔將何及？」

「昨聞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爲，道其來意，並出示分割圖。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爲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凡有外事，四國共之，則俄人不敢出，俄不敢出，則德、法無所附，勢必解散。吾既合日，彼英與日素善，不患不就我範圍。」

宋伯魯、楊深秀二位御史將維新派的合

邦計劃已和盤托出。那麼，應該怎樣評價康有為在百日維新期間提出的這最後一項建議？

從康有為主觀上來說，他是企圖藉此機會來轉移守舊派的視線，緩和局勢，以減輕維新派所受的壓力。當時，榮祿、懷塔布、楊崇伊等守舊派的頻繁的往來策劃，已使康有為感到局勢危迫。但是，對於頑固派如何反捕，康有為並不明確。維新派始終以慈禧會在戊戌九月天津閱兵時「即行廢立」，康有為的《自編年譜》與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都持有這種觀點。然而，這實際上是一種錯覺，也是后黨製造的迷人耳目的煙幕。八月初二日（九月十八日）與維新派關係密切的兵部候補郎中李鍾豫曾遞摺謂：「竊維目今時事艱難，自強要圖，首在武備，皇上恭奉皇太后慈諭，由九月初五日啟鑾，由南苑以至天津，校閱各處操演。此誠整軍經武之隆規。……惟是今年多閏一月，節令較早，九月天氣，即與往年十月無殊，嚴寒道遠，加以校閱勤勞，晷短事繁，似與慈躬珍攝之道，未盡相宜，……若能緩至明年二、三月間，彼時天氣融和，沿途風景，蓋足愉悅慈懷，春色旌旗，發皇飛越，皇太后肆路所經，必更顧而樂之也。」

李鍾豫的奏摺不知是否與康有為有關，但他反映的無疑是維新派的意見，希圖以天氣寒冷為理由，要光緒帝延緩赴津巡閱日期，「以節慈躬，以彰孝治」，從而達到推遲

實行廢立的時間。李摺由剛毅於當日奏上，「奉旨留中」。初二日（九月十七日）剛毅還親自遞上《巡幸天津調取駝馬摺》，略謂：「凡遇聖駕巡幸，所有恭備御營、尖營城以及隨扈官兵，需要駝馬繁多，向由臣部先期調取察哈爾牧群駝馬到京，奏請欽派大臣於啟鑾前七日監放，若不先期調取，誠恐貽誤要差。此次皇上於九月十五日南苑團河恭奉皇太后啟鑾，御輪車由鐵路詣天津行營駐蹕，所有隨扈各差，應否援案調取駝馬，抑或統由輪車赴津之處，臣等未敢擅擬，理合奏明請旨，恭候欽定。」當日即奉旨：「著兵部約計隨扈人數，應需駝馬若干，酌量取於南苑、天津兩處備用。」

據《起居注冊》記載，光緒帝發布此旨時，尚在頤和園駐蹕，對於有關巡幸事宜，無疑是要請示慈禧意見的。李鍾豫請暫緩巡幸的意見未被慈禧採納，而剛毅請調駝馬則奉旨允行，說明直到八月初二日（九月十七日）慈禧在外表仍未有絲毫放棄或推遲巡幸天津的表示。這無形中對維新派造成一種錯覺與精神壓力。正是受這種因素的影響，光緒帝於當天還頒布一道諭旨。略謂：

「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延

延觀望。」

光緒帝讓康有為出京，其用意亦十分明顯，也是為了減輕舊黨的忌恨，以圖緩和局面。他所表白的只「召見一次」，是針對當時社會上廣為流傳的蜚語，說康有為、康廣仁兄弟「日日進宮見皇上」。光緒帝的這種表白，說明當時他有難言的苦衷和所受到的巨大的精神壓力。

正是為了緩和和局勢，轉移后黨視線，康有為提出了合邦的建議。他在為宋伯魯代擬的奏摺中甚至聲稱：「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以保佑我宗社，莫安我疆土。時至今日，危急萬分，守舊之言萬不可聽，伏願皇上獨奮乾斷，速下明詔，庶四萬萬生靈，庶不至淪於異類。」

康有為當時把形勢說得萬分危急，是過甚其詞，其實當時並不存在「淪於異類」的危險，因此，慈禧對這種建議自然不會予以理睬。至於維新派要光緒皇帝「獨奮乾斷」，事實上已成空想，因為光緒帝當時已自顧不暇了，那裡能決斷「合邦」這樣的大事呢？

康有為的「合邦」建議由來已久，是與他的「借才」計劃緊密相聯繫的。早在百日維新開始前後，康有為就曾私下同日本駐京公使矢野文雄約好舉行中日兩國「合邦大會

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大會於各省」。可見，康有為關於合邦建議，規模甚大，條理亦甚詳，只是後來由於懼俄國干涉，矢野文雄也就沒有敢再向總理衙門提出類似建議。而康有為則始終未放棄這種努力。

遷都借才聯邦建議

百日維新後期，與維新派關係十分密切的刑部司員洪汝冲曾遞上《呈請代奏變法自強當求本原大計條陳三策疏》，提出了遷都、借才、聯邦三項重要建議。洪汝冲的這就上書非常重要，頗能反映維新派的觀點。如關於合邦一條，該疏稿謂：

「中國論治，主閉主分，歐西論治，主通主合。蓋閉則智屈，通則智伸，分則力散，合則力聚。故士有學堂之合，農工商有公司之合，歐西所以強盛無他，亦在通與合二者而已。故論地形則同洲者先通先合，論種族則同種者宜通宜合，論文教則同文者可通可合。今歐美各國與我洲異種異文，天之所限，勢難聯成一氣，易啟殺機。惟日本則不然，雖以島夷，國勢驟盛，進步之速歐美憚之，願急於自見，發難於我，受制俄人，致有唇亡齒寒之懼。……為日本者，所親宜無過中國，以我幅員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饒，誠得與之聯合，借彼新法，資我賢才，交換智識，互相援擊，不難約束俄人。……而祖宗締造之業，亦鞏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歐

西，即合為一國，亦不為怪。」

洪汝冲的奏摺公然要求將中國與日本合為一國，這與康有為與矢野文雄的合邦建議何其相似。洪氏此摺很可能由康有為代擬，其理由如下：

第一，康有為於《自編年譜》中曾說過，他自從戊戌七月十二日（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按，據《杰士上書匯錄》記應為十三日）後，「以制度局未開，不復言事矣」。但是，七月下旬康有為又草擬了包括推荐袁世凱在內的不少摺奏，說明康氏所謂「不復言事」，蓋指不自己名義遞摺而已。七月下旬，康氏曾「請遷都上海，借行幸以定之，但率通才數十人，從辦事，百官留守，即以棄舊京矣。力言舊京旅大膠威門戶盡失，俄人屯重兵於旅順，扼吾之吭，無可守矣。又北京連年水災，城崩屢次，塵土塞天，泉惡脈壞，王氣已絕。又旗人環擁，舊黨彌塞」極力主張遷都。但是，康有為沒有說明，他的遷都奏摺是為誰代草的。惟洪汝冲此摺，關於遷都一條，亦稱：「順天負山面海，……自日本一戰之後，德據膠澳，俄據旅大，英據威海，遼渤洋面，戰艦蟻屯，堂奧已危，門戶盡失。況俄人西伯利亞鐵路，直接東陲」亦力主遷都。與康氏《自編年譜》所述。不乏相合之處。

第二，洪汝冲疏稿稱：「中國之自強，惟在日本之相助，英人保泰持盈，其所要求，亦對待於俄而不得已耳，其實商務之外，

無志他圖，此舉若成，則俄人不敢出太平洋，必將修彌兵之會。」查康有為丁酉十二月初九日（一八九八年一月一日）代御史楊深秀草擬的《請聯結英國，立制德氛摺》，即謂英國保泰持盈，「瓜分我地之心，較諸國為緩，特與俄德相形，不肯太讓……日本為自為計，亦必可聽從，而我仍以濟成結英之勢」云云，與洪汝冲疏稿所云，諸多吻合。

第三，八月初五日（九月十八日）御史楊深秀代康有為所遞《時局艱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摺》中稱：「臣聞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遷都借才兩說，而其最要最要者，莫過聯結與國之一條，蓋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為強敵所乘，蹈波瀾之覆轍耳。猶憶前冬膠澳事急，臣嘗建議聯結英美之計，今夏奏請王公游歷，臣又曾有日本宜結之論。今該主事所見與臣閣合。」

楊深秀所述各摺，均係康有為代為草擬，康有為於《自編年譜》中已言之歷歷。楊摺稱洪汝冲所云，與其「閣合」，亦與事實相符，故黃彰健先生推測「洪摺之上或亦係康的授意」。這一推斷應該說是符合當時實際的。康有為代人草摺，在許多場合下並不說明為誰草擬，由誰遞上，這就給我們後人研究其變法奏議增加一定困難。不過，康氏的觀點及奏摺用語，卻有自己的固有特徵，故經仔細辨別，亦不難認出。

李提摩太陰謀詭計

康有為所提出的合邦建議，還與李提摩太的鼓動有着直接的關係。李提摩太係英國威爾士人，英國基督教傳教士，父親是個小農場主。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被派遣來華，翌年在山東烟台登岸。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擔任由英美外交官、商人、傳教士在上海設立的文化出版機構同文書會總幹事。次年同文書會改名廣學會，在李提摩太主持下，擴展會務，大量出書，鼓吹西學。除此之外，李提摩太還穿梭活動於地方督撫、王公卿相之間，指陳時事，兜售其政治主張。作為維新派代表人物的康有為，最早同李提摩太接觸是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七日）。當時李提摩太正在北京與清政府交涉保護傳教事宜。康有為因鼓吹變法受到守舊勢力的攻擊，正準備離京南下。在離京的前一天，康氏來到李提摩太的寓所，「當康有為的名片遞進來的時候，李提摩太正在給他在巴黎的妻子寫信，他立刻去見這位著名學者」。康有為熱情地表示願意「在改革中國的活動中」與李提摩太「合作」，並聲稱「相信上帝是神父，世界各國是兄弟」。臨行，康氏將給皇帝的上書贈送給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閱讀了康有為的上書後驚奇地發現：「幾乎我以前所作的種種建議，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體而細微的計劃中了。無怪乎他來訪問我時，我們有那麼多共同之處。」

這個基督教傳教士聲稱，康有為的改革

計劃和他有「那麼多共同之處」，反映了維新派所受李提摩太宣傳的影響是很深的。通觀康有為的變法奏議，凡有關文化教育、經濟改革以及聯合英日建議等方面都與李提摩太的宣傳結下了不解之緣。百日維新開始之後，康有為由一個普通的小京官——工部主事一躍而為新政要員，躊躇滿志。在得意之際，康有為仍不忘李提摩太，通過書信向在上海的李提摩太請教變法的辦法，並請他作光緒帝的新政顧問。李提摩太欣然同意，很快來到北京。他還曾向康有為建議：「既然伊藤博文那樣成功地使日本變成了一個強國，那麼最好的辦法，是由中國政府請他作皇帝的顧問。」當李提摩太抵達京師之後，戊戌新政正面臨嚴重危機。於是，他建議康有為用「合邦」的辦法來解救危難。據當時的《國聞報》透露說：「教士李提摩太君久居中國，極望中國之振興，數年前曾在上海設立廣學會，著書多種，期開風氣。乙未在京又曾上一疏，所陳皆纏綿往復，不憚煩言。中國士大夫有不愛敬之者。茲李君回國數年，於近日重到北京，聞擬於日內至總署進呈一圖，名曰瓜分中國圖，此圖為外國所定之新圖，與舊圖微有不同，而更為不留餘地。李君譯呈此圖，又復繼之以說，大略謂：此時即欲變法自強，已恐緩不濟急，為今之計，須急與英、美、日三國定一確實聯邦之約，先求足以圖存，而後可言自振也」。

這段報導與康有為於《自編年譜》的記

載基本相符，可見所謂「合邦」計劃的始作俑者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李提摩太。康有為代宋伯魯草擬的合邦方案提出：「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其實，這一方案並不是什麼新鮮貨色，他不過是李提摩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所擬訂的「新政策」的翻版。當時，李提摩太極力主張英國應設法幫助中國結束對日戰爭，使中國不喪失任何領土；而中國則應有所報答，「將實際上在一定年限之內把中國的全部行政移交英國，並且使英國獨享改組和控制陸海軍各機構、修築鐵路、開發礦山的權利，而且還加開幾個新的口岸，對英通商」。

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鏡，原來是一個赤裸裸的並吞中國的陰謀。康有為在變法事業面臨危機的關鍵時刻，請了這樣一個充滿野心的傳教士作自己的顧問，這一舉動實在是不明智的，也是愚蠢而又危險的。這一合邦計劃幸好沒有實行，倘若付諸實施，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無疑會成為對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屬國和殖民地。康有為提出合邦建議的動機，雖然是善良的，是為了解救變法維新事業免遭厄運，但他所採用的手段則是很不光彩的。顯然，康有為是被李提摩太的花言巧語所迷惑。

康有為雖是力圖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中國人，但是卻不通西文，亦未曾到過西方，故

當時對於西學的了解，大多通過傳教士出版的書刊。非但康有為一人如此，陳熾、梁啟超等一大批維新志士都是這樣。這一客觀事實說明，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近代的文化教育、書刊出版方面，曾經發揮過不容否認的橋樑和啟蒙作用。盡管傳教士的主觀動機各有不同。但是，不承認他們的積極作用，而籠統將近代傳教士斥責為「帝國主義分子侵略」的觀點，並非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應採取的立場。然而，傳教士熱心於文化教育和出版事業的動機究竟是什麼，康有為等人並不了解。維新派非常崇拜的李提摩太曾直言不諱地表示：「每一個與廣學會有關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標就是推廣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穌基督才能提供中國所需要的新道德的動力。」

李提摩太講得十分清楚，他們之所以熱心傳播西學，目的並不在於使貧窮落後的中国變成富裕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在於使基督教精神來控制中國，進而實現他的「多與英國商務利益，如准英商在中國開鐵路、開礦山、興辦各項化學工作製造等事。……准其在中國辦二十年」等等。不言而喻，在堂而皇之的言辭後面，包藏的卻是一顆侵略中國的野心。康有為在同李提摩太打交道時，對他十分崇拜，認為他熟諳西法，周知世界，同時又有很大本領，足以挽救危局。但對於李提摩太的動機則知之甚少，甚至錯誤地

把英國當作「救人之國」把傳教士當作救

人於苦難之中的「天使」，對於其掠奪中國的野心很少覺察。其實，李提摩太的所謂「神通廣大」，不過是靠吹牛騙人。八月初四日（九月十九日）康有為向他求救時，李曾向康保證說：「他可以向英國政府說項，取得英國的支持。」這完全是欺人之談，李提摩太根本不具備這樣的本領。戊戌政變發生後，李要求英國駐京公使寶納樂出面保護光緒帝與維新首領，結果，寶納樂只是責備李不應多管閒事，對其要求並未予以理會。當時，英國駐上海外交官班德瑞和白利南向英外交部說明戊戌政變中李提摩太的情況時稱：「李提摩太是英國教會駐北京的辦事人，他是個陰謀家，他大約向康有為和維新派作了一些愚蠢的建議。」

作為英國正式外交官的白利南和班德瑞對於李提摩太究竟向康有為出了哪些主意，並不十分清楚，但是，他們卻把李視作一個「陰謀家」，並說：「康有為是一位富於幻想而無甚魄力的人，很不適宜作一個動亂時

代的領導者，很顯然的，他被愛好西法的熱心所驅使，同時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無稽之談所迷惑。」不難看出，李提摩太的所謂「合邦計劃」，以及說服英國政府支持光緒帝改革的說法，只是他個人的想入非非，事先並未徵得英國政府的同意。難怪上海的英國領事要把李稱作「陰謀家」了。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陰謀家，康有為卻奉若上賓，甚至推薦為光緒帝的顧問。康有為的這種做法說明了他對傳教士的本質缺乏真正的了解，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認識尚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以至於把陰謀家控制中國主權的奸計當成了挽救危急的靈丹妙藥。作為早期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康有為，面臨危難，手足無措，在他的心目中看不到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力量，於是只好病急亂投醫。這種做法非但沒有成效，反而使野心家袁世凱把維新派圖謀推翻西太后的機密轉向榮祿告密，榮祿向慈禧告發，促成了戊戌政變的發生。（未完待續）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三三三期一二四頁第二行第二字以下應為：劉方雄（上海市政府調查處副處長）均派遣人車四方搜尋。

△本期稿擠，周谷「東方美人宋慶齡的故事」續稿延至下期續刊，敬請讀者期待。

△本誌三三三期一一九頁第二段第十一行第十三字以下應為：周偉龍軍校四期畢業，救過戴笠一命，後來因案由毛人鳳報請蔣中正總統核准處死。一二〇頁第一段十八行第四字後應為：由沈之岳、阮成章將軍繼任。一二二頁第一段第十四行第二字以下應為：施放揚、丁懋時任秘書長。一二二頁第二十一行第九字以下應為：成立國家安全會議。